

中国肿瘤史料研究

第一卷

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
中国肿瘤学史料研究委员会
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编委会

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
·2000·北京·

内容提要

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史料研究系列专著,出版目的是搜集、整理、研究、考证我国肿瘤学发展史料,包括肿瘤工作发展,防治研究机构,肿瘤学科及相关边缘学科的建设,重大科研成果,肿瘤教育,重要会议,国际交流与合作,历史人物传略以及其他有关重大事件。内容均为作者亲闻、亲见、亲历的第一手材料,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

* * 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肿瘤史料研究 第一卷/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主编

—北京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,2000 12

ISBN 7-80121-343-2

I 中 II 中 III 肿瘤—防治—医学史—中国

IV R73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8504 号

* *

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太平路 27 号 邮政编码 10085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潮河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5 75 字数 270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00 册 定价 48.00 元

(本社图书,凡有缺、损、倒、脱页者,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中国肿瘤学史料研究 委员会成员名单

名誉主任委员：李 冰

主 任 委 员：张友会

副主任委员：李保荣 孙 燕 郑 树 李连弟

杨天恩 彭 明 高玉堂 戴旭东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万德森 王文亮 王建璋 叶馥荪

刘邦令 汤钊猷 孙 燕 苏璧泓

李 冰 李同度 李连弟 李保荣

李修延 李挺宜 杨天恩 杨秉辉

吴孟超 余桂清 张友会 张文范

张荫昌 张燮良 陆士新 陈峻清

周允中 周有尚 郑 树 郝德治

哈献文 顾美皎 席 宁 高玉堂

鄂 征 屠规益 黄国俊 彭 明

韩 锐 曾 毅 谭颖波 戴旭东

魏宝清

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

编委会成员名单

名誉主编：李 冰 吴孟超

主 编：李保荣

副主编：张友会 鄂 征 杨天恩 谭颖波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孙 燕 李连弟 李保荣 杨天恩

张友会 张荫昌 陆士新 郑 树

鄂 征 彭 明 韩 锐 舒味冰

鲁凤珠 雷通海 谭颖波

序

中国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,在世界上可谓独领风骚。在这一点上,不仅欧洲一些古老的国家莫可企及,即使像埃及、印度以及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,也相逊甚远。

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(Joseph Needham)在他的巨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一书的序言里写道:“中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。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,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,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。”的确,中国有着系统、完整、详尽、准确的史学典籍,称为信史。其余的姑且不去论它,仅三千七百七十六卷的《二十五史》,足可鉴往知今,弥足珍贵,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。

鲁迅曾经说过:“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,指示着将来的命运。”(《华盖集》)虽然他也对史书中有太多的涂饰表示不满,但是,他的这一评价却真知灼见地道出了中国史籍的价值,点明了治史的意义。

中国的治史工作是有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。一方面,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,都很重视记事修史,这使得一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得以被整理实录,前一个时代的史料得以被总结编纂。另一方面,国家还在组织上给予保证,置有司、设史官、定规范,使治史工作虽经战乱频仍、朝代更迭而不致中辍。中国政治大一统格局的相对稳定也给治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远在公元前221年,“千古一帝”秦始皇就在政治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。他设置郡县,修典章制度,使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,可谓功盖千秋。这以后的两千多年间,虽历经分合,但思想上的大一统观念和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,始终占据着中国历史大系的主导地位,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撼动的主线。这一政治大背景十分重要。历朝历代,从巩固中央政权出发,无不注重以史为鉴,“明得失、知兴衰”,总结前人经验以资己用。

中国的修史工作有成功的经验和方法。这就是前人搜集、

整理,后人总结、修撰。虽近乎约定俗成,却又绝非偶然,而是有它被普遍认可的道理,符合治史的原则。除去诸多时代背景因素之外,最主要的还是今人察今弊于不周,后人鉴前或观毫末;时人言时事,易于实录,黯于评断;后人言前事,无忌左右,敏于论说。况且,许多史料的记载,尚需时间的考验,方能使它趋于完整、信实。如上所述,整理和撰写我国的科技史、医学史以及学科发展史,也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和方法。即便如此,经广泛搜集整理和研究所编出来的史著仍不免为研究者所指疵,足见治史之难!

近10余年间,肿瘤学界屡有治史之议,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。学界普遍认为有必要对过去的历史加以整理。中国的肿瘤事业渊源既久,而近40年来发展尤快。无论是肿瘤防治研究机构的建设,抑或学科建设,都呈现了繁荣景象。科研成果、学术成就、技术水平等成就斐然,令国际同行所刮目。而人材济济,后起之秀辈出,更使人们充满信心。但是,所堪忧者,老一辈肿瘤工作者有的先后寂然谢世,有的年近古稀甚或耄耋,而创业经过多有参与,知之甚详。从治史的角度考虑,应当趁精力尚健,做些中国肿瘤事业发展史的研究整理工作,不仅再建赓续之功,且为后人修史奠基。征诸学界同仁,均感意义重大,莫不赞同,遂决定组织中国肿瘤学史料研究委员会和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编辑委员会,负责这项工作。

我们所要搜集整理的我国肿瘤事业发展史料,从时期上划分,包括建国以前,上溯近代和古代;建国后以迄20世纪终末。至于21世纪发生的事件、实迹,当然也需加以搜集,详为记载。而在这三个阶段中,建国以近的史料尤为重点,亟需尽快整理。

此外要强调的是,为了使我们编辑出版的史料尽可能完整、详尽、客观、准确,我们非常盼望广大读者,包括当事人、知情者,能对发表的史料提出补充、订正意见,或者从自己亲历、亲闻的角度,另行撰文,展开讨论研究。

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一书分卷连续出版,公开发行。本书的编辑宗旨在于搜集、整理和研究我国的肿瘤史料。范围包括我国的肿瘤工作发展史、防治研究机构建设史、肿瘤学科和相关

边缘学科发展史、重大科研成果史、国际交流交往史、国际合作史、科学技术发展史、肿瘤教育史、重大事件史、名人传略、史料考证,以及其他堪供参证的历史资料等。为了尽量避免舛错,留下史疑,要求撰写史料者尽量提供所撰史料的“依据资料”或“核查线索”,免致编者周章和读者以讹传讹,致谬误流传。当然,由于种种原因,佐证或有不足,亦可凭个人回忆写出与读者商榷,均属欢迎。

我们怀着极大的热忱,盼望我国肿瘤学界的前辈和正值盛年的专家学者,游学或侨居海外的同道们,能在工作繁忙之余抽出一点时间来为本书撰稿。这种利在当代、功及后人之举,想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与积极的参与。让我们共同努力,整理出翔实可信、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,就教于广大读者。

李保荣

2000年10月于北京

前 言

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终于出版了。这是许多关心这件事的同道们所期盼已久的,也是我国肿瘤学界的一件大事。当您展读这虽说粗陋但毕竟可贵的第一卷书时,相信是会感到欣慰的。

我国的肿瘤工作始于何时还说不准确;但是,近四五十年由奠基到发展,则为人们所共睹。在这一并不算长的时期里,我国的肿瘤事业,无论是防治机构的建设、高发现场工作、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临床医疗实践,都取得了足以令人骄傲的成就。许多肿瘤工作者由英姿勃发到两鬓霜染,把自己的青春乃至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抗癌事业。应该说,20 世纪的下半叶是我国肿瘤事业由雏形而发展壮大的历史阶段,有着辉煌的成就。

当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,人们,特别是老一辈的肿瘤工作者,抚今追昔,感到有对既往的历史加以回顾的必要。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实践未来。于是,我们广泛联络了有志于此的同道,决定动手搜集整理我国的肿瘤史料,编纂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。应该说明的是,本书的性质是分卷出版的史料著作,不是编写我国的肿瘤学史。编纂宗旨在于广泛搜集、整理和研究我国肿瘤事业的发展史料。搜集的范围包括肿瘤工作发展、防治研究机构建设、肿瘤学科及相关学科建设、科研成果、人才培养、重要会议、国内外交流交往及合作的情况,以及肿瘤学界名人传记、史料的考证研究和订正等。

为了使史料翔实有据,要求以自己的亲闻、亲见、亲历为依据,客观而真实地撰写。

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,特别需要老一辈肿瘤工作者,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,提供第一手的材料。结合自己的经历,对所掌握或能够查找到的资料,下一番研究整理工夫。这样,我们将会给下一代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,为后人系统、完整、客观地编写中国肿瘤发展的历史奠定基础。

准确地说,本书第一卷的出版意在抛砖引玉,希望能引起广

泛的兴趣和注意,发动大家积极参与到肿瘤史料研究工作中来。

对于治史工作,我们是缺乏经验的。但是,我们确信,在越来越多的同道们的支持和参与下,将会一卷比一卷更充实、更丰富、更翔实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,也会显示出它的历史生命力,为我国的肿瘤事业作出贡献,并会受到广泛的欢迎。

由于是初次尝试,着手编辑又较仓促,疏漏在所难免。衷心希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中国肿瘤学史料研究委员会
《中国肿瘤史料研究》编委会
2000年11月15日

目 录

“流水”六十年	李 冰(1)
我国抗肿瘤药研究开发的历史与回顾	韩 锐(28)
癌基因研究的兴起	鄂 征(34)
肝脏外科学五十年进展	吴孟超等(39)
我国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发展概况	李同度(46)
中国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	
——记第一次全国人口 3 年死因回顾性调查	戴旭东(50)
我国肝癌筛查工作的起始	杨秉辉(54)
福建省肿瘤防治工作的回顾	苏璧泓(59)
鼻咽癌防治研究史略	闵华庆(65)
食管癌防治研究小分队的发展及其成绩	王建璋(75)
中国癌症基础研究进展史琐记	李修延(92)
广西原发性肝癌研究	王威廉等(96)
医患结合群体抗癌模式的诞生和发展	师建国等(108)
回忆肿瘤工作	李挺宜(117)
我国推广 WHO 癌症镇痛疗法的回顾	李同度(123)
六届全国肿瘤工作会议简况	李连弟等(127)
四川省肿瘤防治研究史略(1954~1986 年)	李修延(138)
李光恒与肿瘤学期刊	白润萍(143)
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肿瘤学科和相关	
边缘学科的创建与发展	张文范(149)
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研讨会会史	彭 明等(162)
《中华肿瘤杂志》创刊及发展史略	谭颖波(168)
全国肿瘤学期刊研究委员会的组建与工作回顾	彭 明等(175)
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、肿瘤医院简史	王建璋(181)
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发展史	刘邦令(197)
中国胃癌研究的发祥地——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	张荫昌(212)
发展中的盐亭肿瘤防治研究所	杜辉章等(219)
忆 1980 年访问美国(之一)	张友会(225)
吴桓兴	李保荣(229)
李光恒传	白润萍(237)

“流水”六十年

李 冰

在我的生命之中,75 个年头已成过去之际,我不免做了一番回顾,并接受了同志们的敦促,写了如下的一篇自述,但没有接受称之为“风雨六十年”的建议。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篇一生“流水账”,所以还是叫做“流水六十年”吧。

在我从业 60 年的漫长岁月之中,没有什么个人轰轰烈烈的场面,也没有什么消沉退缩的时候。千千万万个日日夜夜不停地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,是什么在支持着我?直到我将要离开岗位的时候,我才开始思索这一问题。我

像一般的那些年代投身革命的人们一样,没有什么个人“升官发财”的动机;也像他们一样,有些奋斗救亡的热情与决心。但是,贯串一生的恒久的动力,自然不可能得之于一时一事。经过了革命队伍中几十年间绵绵不断的培养和锻炼、挫折与考验,才渐渐明白:持久的动力只能来自实践与生活本身。我希望我的“流水账”能够说明这一点。



李冰同志近照

在我的幼年时期,我的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并从事地下工作。由于国民党不停的搜捕,他到处东躲西藏。对于白色恐怖,我们从孩提时期就印

象深刻,并自然地种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社会的不满,从小就知道父亲参加的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过好日子而奋斗的党。父亲一直是被通缉的“要犯”,我们多年不知其生死存亡,却不时从当时报纸看到他被捕被杀的消息。只是因为祖父在当地还有些名望,家庭尚能勉强生活下去。我们上小学时,家长的名字不是李克农,而是祖父的名字。经济上依靠祖父的积蓄和母亲做小学教员来维持温饱。随着我们长大,生活也愈来愈困难,也愈靠借债典当度日。书不能读下去了,我姐姐高中只读一年,就去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,大弟也被送去当学徒。

母亲考虑到家庭供不起我升学,初中毕业后让我去考了美国教会在安徽芜湖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,因其可以4年管吃管住,毕业后有文凭,也易找工作,但进护校要交50块银元的保证金。现在印象仍很深刻的是,母亲为此到处借债,当掉她稍微值钱的东西及衣服。幸亏当时外婆家情况略好,我才考进了护校,录取名次还排在前边。当我离家去护校,母亲含泪送我时说:“以后的日子靠你自己了,不管怎样要坚持,将来一定要做个‘有出息’的人”。从读小学到中学,母亲常用“有出息”来要求我们,所以读书时非常拼命。学校离家很远,都是天未亮即离家,中午靠带去的锅巴做午餐。我与姐姐每学期都是前三名,可以免交学费,略减家庭负担。那时在“凄风苦雨”的困苦生活中,母亲为供养我们所遭受的苦难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二

1936年是我离开家庭,进入医院护校,亦即进入社会的第一年。当时,我刚16岁,从未离开过家,对社会根本不了解。从小生长在那样的家庭中,突然进入洋人办的,又是教会性质的洋地方,从院长到教员及职工,不少是美国人,且都是基督徒。我这个非教徒,还有三四个非教徒同学被歧视是必然的。为了不被歧视甚至落得被除名的下场,我们几个人商量,还是跟着他们去做礼拜,参加各种教会活动。但于是被迫的,所以也当然不是那么虔诚。虽然闭着眼睛,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的圣经,只是为了争取能顺利毕业,将来可以找到工作。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则非常努力,小心翼翼,逐渐得到好评,考试成绩也优良。于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也就逐渐习惯下来了。现在深深体会到,一个安逸而无负担的生活环境,加上

宗教的熏陶,又无经常性的家庭教诲,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,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。

谁知好景不长。1938年,即我进入护校两年时,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。美国人及其眷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纷纷逃离芜湖。我们全家也逃回原籍巢县的乡下暂避。由于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,日美尚未宣战,当时我们医院在长江下游是较大而有名的教会医院,日本人一时未来进驻。医院又占地较大,不少难民、教徒都纷纷躲进医院,找空地搭棚子暂住。母亲临逃离芜湖时与我商量,认为目前医院还是安全的,能坚持再学两年拿到文凭,将来找工作也容易,所以要我继续留下学习,两年间和家人简直完全不通音信。两年的敌占区生活,虽然未直接受到日本人的迫害,但对无行动自由的亡国奴生活还是有体会的。不能随便离开医院的大门,若出去必须向日本人鞠躬,低声下气地接受盘查,所以轻易不出大门。如此闭塞的生活,直到1940年毕业。我们班原来招生时30人,到毕业时只剩下4个同学,非教徒只有我一人。记得第一次拿到薪水时我大哭一场。因为家人无信息,我也无处可去。而医院当时因大批人员不断离去,很需要工作人员,所以我们班上4人都被要求留下工作,薪水也增加了些。可是有了薪水不能帮助母亲,心中也很不安。当时,由于日军不断推进,母亲带着家人也在逃难,根本无法与我联系,也是怕联系了对我不利。由于当时还存在着“国共合作”,父亲已有了消息,所以母亲领着一家老少,步行找到武汉父亲处。以后随着日军进逼,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、贵州与广西。在武汉时,父母决定将我姐姐及两个弟弟送到延安学习。这时我还是一个人留在芜湖。除了怀念家人就是一味努力工作,所以很快被提为手术室护士长。我当时也不敢在兵慌马乱之中独自远行,所以也只好安心等待着。

1940年经历了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大变动,它决定了我20岁以后的人生方向。平静安逸、收入较多的护士生活一下子就宣告结束了。这时日美关系渐趋紧张,渐渐临近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。日本人由过去的不予干预变为不时来医院巡视,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治疗。医院人心惶惶,能有办法的都陆续离去,院长及其他美国人也在撤离。最后只剩下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和护士长,医疗工作只不过是维持而已。可是我们到哪儿去呢?心里一时惶惶无主。

意想不到的事突然来临了。有一天,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找到我到他的办公室去,神情紧张地问我的家事,并问我的原名是否叫“李双凤”。他说日本人来医院调查了两次,两次询问芜湖共产党人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在医院工作。由于我进护校时已改名“李静彬”,家长是祖父李哲卿,当时院长只答应调查。第二次日本人又来催问,院长就劝我赶快离开,美国人也怕日本人来找麻烦。可是生活到20岁,还从未离开过家乡,火车都未坐过,现在也不知家人在何处。我投奔何方呢?急得我整天只有哭泣,有的同事家在上海,想帮我到上海暂避。

真是上天保佑。很快有一天,两个陌生人来医院找我,完全是一般老百姓的装束。他们说,我母亲派他们来接我去上海,并给了我路费。他们还告诉我到上海车站有人来接我,并交待了如何找到接我的人。正好此时,有一个家在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,于是我便与他一道,匆匆忙忙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。到了上海,来接我的是我父亲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,我小时常到我家的一位“伯伯”。他说他们很担心我被日本人抓走,所以急急忙忙将我接出来了,并说是我母亲离开芜湖时托付他们照顾我的,可是两年多以来,在芜湖他们从未与我接触过。我幼小时所见到的这些人,与我父母同时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风貌毕竟还能忆起一些。他们都是默默无闻,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。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。他们默默地、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,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,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,家庭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。我是幸运者,又有什么艰难委屈不能愉快克服呢?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,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。

在上海住了两个月,等待机会到“大后方”去找父母。当时,我父亲任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。但由于日军已侵入云南,滇缅公路已被封闭无法通过,地下工作者只好将我送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某处等待机会。大约一个月后,在香港集中了8个青年,其中只有我一个女的,还有彭湃的儿子和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。又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神通广大,在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下,从香港经过九龙,偷渡到广东的淡水,经惠阳而入内地。沿途也有人接应,十分紧张地在敌区中钻来钻去,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有时是坐小船晚上走,白天则停止隐蔽,有时则坐在自行车的货架上,称为“二等车”。我们又害怕、又兴奋,第一

次尝到了“干革命”的味道。因为都是青年,常不能掩饰内心的兴奋而忘情地大声说话或唱歌,受到带队同志的不断警告。就这样,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,终于到了广西桂林。我被送到父母亲处,其他同志被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,直至到达延安才陆续见了面,有的到前线去了。这是我进入革命队伍的开始。在这几个月中,对党的上识加深了,立志革命的决心开始打下了一些基础。

我在桂林办事处等待安排。父母考虑我有护校文凭,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作为掩护,留在广西工作。后来又想利用我党与桂系李宗仁及白崇禧的关系,让我进广西医学院学习。经过“关系”的交涉,广西医学院已同意我入学,只等待办入学手续了。我也很高兴,可以进大学了。可是,命运总是不断在变化。突然间“皖南事变”爆发了,我的“大学梦”也破灭了。父母亲考虑我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,不宜留在桂林,要我随办事处的同志先行,经重庆到延安去。这样,我又离开父母,随同志们离开桂林,乘军用卡车经过贵阳到重庆。贵阳一带都是山路,公路建设也不好,来往军车很多。我与一个女同志同坐在卡车的货物上。我们坐的车在一次转弯时与国民党的运盐车相撞,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。当时,我们看到卡车轮子四处飞,盐也都散了,坐在上面的人据说都死了,而我们也差一点翻车。当时开车的是一位华侨,也吓得要命。带队的同志命令他不要停留,赶快开车跑掉,否则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必被扣留。于是车行一夜未停,次日在一小镇,找一个简陋的小旅馆休息了一夜。这是我有生以来,更是参加革命以后第一次差点丧命,所以记忆至今清楚。

到了重庆后,住在办事处的招待所,地址在红岩办事处附近,周围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监视我方活动,有的特务还明目张胆地在办事处及招待所门前来回走动,若我方人员外出,他们一定跟踪。当我们到达重庆后,即被传授一旦被跟踪如何甩掉他们的办法,我感到十分新奇。我的二叔当时在重庆工作,也不是什么秘密处所,所以组织上同意我去看望他,结果遭到跟踪。我也在与他们兜圈子时把他们甩掉了,感到非常兴奋;不过组织上再不许我到其他地方去,又感到很失望。

在重庆初次见到周总理夫妇,并受到他们长辈式的爱护与关怀。当时我父亲还在桂林,他们多次叫我去看他们,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虽然你是革命的后代,可是并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,如果只凭一时的热情

与兴奋,而没有立志下大决心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。又说,你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,生活比较优裕,有没有吃苦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?你要考虑啊!当时自己还正在兴奋之中,当然回答得十分干脆。其实当时自己对革命的长期性、艰苦性认识得并不深刻,但由于对周总理这样的革命前辈和自己父母的敬爱和感情,所以后来每逢遇到困难时,总会想起他们的教导以及自己所作的承诺,这些恐怕也应算做日后“动力”的一个来源吧!

1940年底到1941年初,当时“国共合作”已濒于完全破裂,各地办事处都被撤销,形势极其紧张。周总理及我的父亲已处在对方严密监视之下,但仍紧张工作,安排日后的长期斗争。同志们随时有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。大家紧密团结、准备战斗到最后的牺牲精神,使我这个初入革命之门的青年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鼓舞,并曾向人表示,很想留下来坚持斗争。当时我的“小资产阶级狂热”已达十分高涨的程度。组织和父母立即给我以教育,凭一时热情参加革命的青年,如不认真加深对革命的认识,热情一过,遇到挫折就必然是退缩消极。我的幸运之处在于,我总是及时地受到这些教导。我想,这或许是日后工作中较少产生动摇的原因之一。

从重庆撤退到延安,是与父母、小弟以及办事处部分同志在一起的。我的父亲当时仍是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秘书长”。我们一行三辆大卡车打着“奉命撤回”的旗子向延安撤退。“国统区”只有周总理及重庆办事处的部分同志了。这时,内战已迫在眉睫,沿途碉堡林立,岗哨如毛。当我们一行走到陕西潼关时,突然间,被几挺机枪阻住了,并缴了我们的枪,扣留了人员和物资,人人受到了盘查,形势十分紧张。我父亲悄悄对大家说:“我们有可能被扣押,要有思想准备进集中营”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惊险场面。由于不久前受到过一些教育,这一次并未感到突然,反而觉得是面临考验而心情兴奋。

毕竟此时国共尚未正式破裂。延安党中央及周总理紧急交涉之后,我们受到的一天两夜的扣留结束,改为“押解出境”。一路之上,大家既高兴,又怕再度被扣,所以加快速度疾驶延安。记得抵达边区时,远远看到披着老羊皮袄的我方岗哨时都跳起来了,几乎跳坏了车厢底板。对我来说,这是真正进入革命的边区,且第一次亲身经历惊险场面,所以50多年之后还记忆犹新。

当我们全家回到延安后不久,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我们到毛主席住

处吃饭时,毛主席对我父亲说:“你们是冤家路窄,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”(因为驻守潼关的最大特务是在我父亲手上吃过大亏,并遭蒋介石申斥的徐恩曾),毛主席还开玩笑地问我,“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?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”。过去,我对父亲的工作确不十分了解,他也从不向我们谈及自己的工作经历,我也从不敢随便打听,只是在以后很久才渐渐知道,他原来是多年以来,一直活跃在“白区”甚至国民党首脑机关内部的一支“特殊部队”的总指挥官。同时,我也渐渐听到其中一些无名英雄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,这些都极大地激励着我。

三

新的生活开始了。1941年春到了延安,从城市来到了群山环抱的黄土高原。清澈的延河傍城而过,层层窑洞依山排列,晚间看来很像是灯火辉煌的高楼林立。神态愉快、意气风发的一群群年轻人活跃在各个山沟之中。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,边区也尚未开展大生产运动,所以生活艰苦,吃的是小米土豆与瓜菜黑豆。我记得第一次吃小米饭,在口中转来转去就是咽不下去,只好用水冲下去。住的是又黑又凉的土炕,晚上点的是用小瓶自制的煤油灯。第二天起床,每人的鼻孔都是黑的。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这群来自城市的青年是够苦的,但奇怪的是当时大家从未叫过苦,相反个个快乐异常,尤其是夕阳西下时的延河边歌声不绝,欢笑嬉戏,一片乐园景象。当时,还有不少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“文化人”,组织了“文化俱乐部”,开展各种文化活动,更为青年人所喜爱。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到处传习演唱。每周末组织交际舞会,我们青年人可以步行几十里山路去参加,散场后又步行几十里回来而不觉疲倦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一些老同志一起谈论这段生活,还是不胜其怀念之情。当时大家心情愉快,什么杂念也没有。每日工作与学习革命道理,使我们的生活内容很充实,所以物质生活苦一些,也就不理会了。记得当时每月只有几元边币的津贴,发放后大家凑在一起,买点猪肉和红枣,用面盆煮一大盆所谓“小灶饭”,大家围着吃完为止,而日常就只能是一般的“大锅饭”了。

后来我常想,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,能那么心情愉快、无忧无虑地团结在一起?当然,延安不是前方,离火线比较远一些,但主要还是由于那时没有政治压力,大家彼此之间是正常的同志关系。形势总是在